

实事求是:中国革命和建设 道路理论的基点

陈 万 松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以毛泽东、邓小平为首创立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其突出之点就在于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是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在实践中探索真理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的创立,中国革命和建设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其中随处都体现的理论基点与思想精髓就是毛泽东、邓小平都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

关键词:实事求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基点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3-0005-07

自 1921 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 80 年的历程。8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其中,艰苦的探索同失败的苦涩及胜利的喜悦交织在一起,共同写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写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回顾这不平凡的 80 年,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总结中,探寻出了一条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宝库。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中,虽然历史时期不同、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也不同,但都共同体现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的哲学基础、思想灵魂和成功根源。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

古,实事求是”,后人注释为“务得实时,每求真也是”[1](338 页)。1941 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478 页)这一哲学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中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与建设的性质、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革命的力量、实现中国革命与建设目标的途径三个方面的认识和实践。

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不清,因而也认不清中国革命的性质,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找不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到,自 1840 年以来封建主义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立足的基础,帝国主义则

是封建主义得以苟延残喘的支柱。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上述认识,中共二大《宣言》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3](43页)。二大提出的纲领有两个十分明确而又重要之点:一是明确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主革命的任务(反帝反封建);二是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点的提出都是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事求是认识的结果,为后来确立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

中共二大对国情的认识和对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显示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初步揭示,但在对这一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准确表述上,党内外却有分歧和差异(尤其在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外的陶希圣和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托陈取消派”都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性。陶希圣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已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4](94页),陈独秀则认为中国“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即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4](95页)。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确认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李立三、李达等也批判了否认中国社会具有封建性的观点,李达还在其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将中国社会性质明确表述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4](95页)。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未轻率地发表意见,他要将自己的看法建立在对国情(尤其是农村)的深入了解上,建立在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变迁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总结上。他从中共二大后即本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一直坚持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了大量的文章,逐步完成了他对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坚持了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确认,表示了他对李达等人的观点的赞同。他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5](128页)“这个社会的

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5](523页)后来,1939年12月,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大部分国土沦陷的情况,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还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5](589页)这一表述的微小变化,既不影响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认识,又恰能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基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当时的社会性质就有正确的认识,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2](704页),这个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即明确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虽然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出现了“左”倾冒进错误,但不久毛泽东及中央即觉察到了失误,并加以纠正,指出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一纠正表明党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正确的认识,但遗憾的是将进入共产主义前都笼统视为社会主义。虽然毛泽东曾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但总体上对社会主义的阶段性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尤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缺乏科学的判断,是一种大过渡的理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依据中国经济基础较差、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弱的国情,作出了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1981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二大报告都明确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6](252页)中共十三大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论证,解决了一个几十年都未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认识的突破,如社会主义

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问题,即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的问题;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问题,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6](148页),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等。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无疑也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二

1927年以前,中共一部分领导人在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始终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认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这种错误的认识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认识。党内一部分人,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始终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要薄弱和幼稚一些,也没有参加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可能。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因此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而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而中国的农民阶级“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难苟安”,因而“难以加入革命运动”;中国的资产阶级则不然,“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7](106页),理当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上述认识直接影响到我党对国共两党和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就指出:“中国现存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中共三大《宣言》也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3](67页)以上表明,中共自居于一个国民革命的追随者和从旁协助者的地位,放弃了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由于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国民革命兴起后,右派逐渐得势,革命最终失败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实当时党内如毛泽东等人对革命领导权和力量并不乏正确的认识。毛泽东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就曾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尤其是贫农最革命,否认贫农便是否认革命。遗憾的是,这些真知灼见在党内并未形成共识从而起到主导作用。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尤其是遵义会议以后,“左”倾路线的终结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力量扫清了障碍。毛泽东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对无产阶级优缺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详细而又客观的分析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5](608页)“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5](608页)“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5](601页)“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5](602页)这些正确思想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和政治纲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都得到了体现。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坚持以上思想。建国前夕,他就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5](1415页)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也一再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强调要重视农民问题、民主党派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744页)。

邓小平参与了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并在毛泽东之后继续坚持和加以发展。他多次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

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6](164页),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明确地强调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6](345页),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来建设社会主义[6](161页)。他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各阶级状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新的分析,作出了新的认定。他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工人阶级由于同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觉悟最高,纪律性最强,能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6](136页)。“我国农民已经是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6](185—186页)。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劳动者”,“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6](186页)。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6](186页)。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所做的求实求是的科学分析,尤其是将知识分子划归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一改长期以来的错误认识,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三

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经过了两个时期,即1921—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和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的时期,两个时期走了两种不同的革命道路。

中共二大后,党便积极探索民主革命的道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对第一次工人运动失败的惨痛教训进行反思后,中共三大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民主革命。这是一条国共合作、共同推进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它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但由于忽略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武装和土地革命,国民革命最终失败。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重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严峻问题摆在共产党人的面前。中共“八七会议”认真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军队。”[7](102页)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在对失败教训的总结中,已开始真正认识到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后来党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确立革命新道路的开端。但在“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和复仇情绪的影响下,共产党人对当时革命的形势、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等并未有客观、清醒的认识,仍然选择了俄国式的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相继在全国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结果均告失利。应该说,武装反抗是正确的,但选择城市则违背了当时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实。周恩来后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曾指出:“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州,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8](80页)城市起义失败的教训使一些共产党人开始重新思考和探索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率部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道路,一批早期优秀的共产党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选择。但是,毛泽东等人的选择没有在党内引起重视和共鸣,中共六大的决议就没有“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9](182页)。在井冈山时,也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够扛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得出革命形势是低潮而不是高潮,是两

个高潮之间的低潮；革命不是停止而是在继续发展，应把革命的进攻与退却有机结合的结论。同时又依据中国因军阀割据而形成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得出党应该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5]（95页）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也强调：“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5]（56页）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已真正对中国国情、民主革命和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有了实事求是的认识，已为落实“八七会议”确立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结合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从井冈山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并由此扩展到全国。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确立也经历了两个时期。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始终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原因很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状况、经济建设的规律等缺乏实事求是的认识却是最根本的原因。邓小平承担起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重任以后，本着求实创新的原则，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客观地总结历史，面向现实，着眼未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一贯的经济思想，在“文革”后期他复出后，就顶住压力提出要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抓经济建设的恢复。粉碎“四人帮”后，他总结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的历史，得出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以未能得到发挥、生产力水平之所以还很低、人民生活之所以未能得到多大改善，根本原因就是未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此，他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根本目的出发，反复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把经济建设作为八十年代三件大事的核心。他强调指出：“离开了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6]（250页）改革开放是一个基本点，也是经济建设的重大措施。邓小平以求实的精神，正视我国政治、经济存在的弊端，正确分析和把握住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解体后国际形势与格局的变化，把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应抓紧的四项重要工作之一，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长期基本国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另一个基本点，事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邓小平始终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6]（164页）这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特性，是邓小平一贯思想的体现，也是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精髓。

四

正是基于对上述三方面问题的不解探索和正确认识，毛泽东历经艰难，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邓小平也历经曲折，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结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硕成果，使中国人民富了起来。分析比较毛泽东、邓小平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的创立过程，不难看出有以下共同之处。

1. 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确保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正确方向。这是创立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的出发点，也是成功的保证。毛泽东始终坚持和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性质，他提出应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5]（565页）。他也始终坚持和强调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5](614页)邓小平也始终坚持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地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6](266页)正是毛泽东、邓小平坚持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在失败和挫折中重新崛起,回到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道路,取得辉煌的成果。

2.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毛泽东、邓小平坚持马列主义,但不死板地套用马列主义,而是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毛泽东曾总结性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5](775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放箭要对准靶”[5](777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5](753页)。“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5](758页)。邓小平也总结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6](95页)毛泽东、邓小平这样说,也这样做。正是由于他们对理论不墨守陈规、照搬套用,坚持将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在运用中创造,在创造中发展,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

3. 坚持并善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在斗争中求统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此,毛泽东、邓小平既坚决同有违道路理论的“左”右倾思想作斗争,不容许对大局的干扰;又不断通过实践、通过教育来说服有不同看法的人,求大同、存小异。正如邓小平所说:“既然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即使在主张和提倡改革的人当中,保留一点怀疑态度也有好处。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6](156页)这种将原则的坚定性同灵活性相结合,以理服人、以实服人、以斗争

而不是以妥协求统一、求团结的高超斗争艺术,是确保革命和建设道路方向不动摇,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之点。

4. 坚持并善于在失败中总结教训,勇于和善于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都是在革命和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总结经验教训形成的。毛泽东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前后的经验教训,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邓小平也是在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失误后,才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条道路的形成,既印证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古训,更体现了毛、邓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对待失败的辩证态度。如毛泽东所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2](845页)邓小平也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6](229页)事实证明,无此,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不可能形成。

5. 坚持并善于发挥集体的智慧。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的形成并取得胜利,凝聚了两代领导集体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硕果。从三代领导集体到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都为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的探索和形成作出了贡献,毛泽东、邓小平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在上述相同之点外,要说不同之点,除了历史背景、面对的敌人、解决的任务等客观情况有所差异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两位伟人对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坚持的结果。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历史原本赋予了他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重任和机遇,遗憾的是他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生产关系的过渡、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意见分歧与路线相悖的区别等一系列问题上违背了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出现了不应有的重大失误,以至未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作为第一代领导成员、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总结了历史和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始终坚持和强调实事求是,以此作为考虑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设计并领导了中国社

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铸就了他革命事业的辉煌。

对于道路理论,两位伟人的话作了很好的说明。毛泽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的客观世界。”[2](825页)邓小平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6](29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讲话明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是在通过对失败与成功经验的不比较总结中掌握的。这一不断认识、比较、总结、掌握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4]转引自:李君如.毛泽东与近代中国[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7]转引自:陈万松.艰难曲折的民主革命[A].昨天·今天·中国世界丛书:之四[Z].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 [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9]周恩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Seeking Truth from Fact: Basis for Way Theori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CHEN Wan-so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way theori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established by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and resulted from summing up lessons of failures and exploring truth through practic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an embodiment of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and Chinese revolution's reality. It is due to their establishment that China achieves great success in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hile their theoretical basis i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 advocated and practised by both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Key wor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way theory; basis

[责任编辑:苏雪梅]